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PINDE
XINLIXUE

欧阳文珍 著

品德心理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PINDE

欧阳文珍 著

品德心理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德心理学/欧阳文珍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81052-935-8

I. 品... II. 欧... III. 道德心理学
IV. B82-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324 号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品德心理学

欧阳文珍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全国各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348 发行部 0551-5107716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787×960 1/16
责任编辑	谈 菁	印 张	19.625
封面设计	安 福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935-8/G·289

定价 2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1999年我担任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老师,在一次普通的课堂讨论中,学员们对于中小學生品德状况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课后我连夜制作了一个简单的问卷,对前来培训的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在236份有效问卷中,认为改革开放20来我们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有225份,认为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的有227份,确认国民道德水准提高了的仅仅只有3份。也就是说有95%以上的人肯定这20年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受教育水平提高了,而道德水平没有提高,甚至是下降了。虽然这次调查由于这部分样本的特殊而存在着一个外部效度问题,但结果仍然让人感到震惊。

出于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职业敏感,我随后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到20世纪中后期全球正在为共同的道德问题所困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 and 道德危机:青年一代精神迷茫、信仰动摇、消极颓废、自私冷漠,道德水准每况愈下;犯罪、吸毒、酗酒、暴力、纵欲……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教育培养了一批“利欲熏心、精神颓废、道德沦丧而又技艺高超的野蛮人”。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4年在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上警告:“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

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文化对科技的过分张扬、学校教育对智育的过分强调以及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科技人才观,是全球道德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就人的生存来说,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对精神世界发展的向往,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内驱力。所以德育作为促进人类自身不断发展的社会工具,不能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与和谐,德育回归生活世界,既是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合乎人性的要求,也是解决现代人精神困惑的必然选择。因此,目前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均不约而同地关注人的品德、关注品德的培养,复兴道德教育的呼

声一浪高过一浪。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道德健康”写进了“健康”的定义。美国前总统里根指出美国所以存在教育问题,不是因为钱化得不够多,而是因为钱花得不得当,没有把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化在德育教育上。英国学者提出德育投资并不是“非智力投资”,它很快会得到“经济偿还”;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把道德教育改革放在突出的位子,明确把以前“智、德、体”的排序调整为“德、智、体”。1993年在广州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认为:“在未来的21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

事实上,进入新的世纪,人的首要素质是美德,德才兼备,德为先!这种新的人才观应该也必将取代科技人才观。因为一定社会的人才观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农业社会看重人的体力,身体强壮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也是社会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工业社会则看重人的脑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出了空前的要求,人的科技素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知识能力被看做人的最重要的素质,科技人才观一统天下;今天,社会进步和道德发展二律背反问题日益严重,在高等教育日渐普及的背景下,空前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一体化问题。一个人在知识技能越多、品德素质越低的情况下,他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越大,就能为非作恶越大”。高科技既给人类带来空前的高效益,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高风险。高科技使人类更具有异化的可能,同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条件,高科技要求以人为本,要求人文精神的复兴,要求人首先有美德。

然而美德何以形成?“美德可教”吗?

这显然是一个难题,一个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思索、争论,直至今天仍然尚未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目前均普遍存在着德育的实效性问题。

显然,提高德育的实效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美德,作为人的个性的一部分应该有其形成、发展的规律,任何培养、训练等教育干预只有在符合这些心理规律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是有效的和高效的。20世纪后期心理学界有关内隐心理,特别是内隐学习、内隐记忆研究的新进展

给我们研究个体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心理规律以十分有益的启发,使我们得以形成德性养成的基本思路。

感谢江苏省委宣传部规划办将本选题列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使我们得以系统梳理自苏格拉底以古今中外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关于个体品德养成的思想,客观审视现行德育目的、模式和方法的利弊,全面介绍当代西方有关品德心理研究的最新进展,认真探讨德性养成的心理基础,细心分析德性养成的途径与方法。正是这一课题的立项,使本课题的研究能够走到今天,使得本课题的研究能够深入到“新理念的提出、新模式的建构和新途径和方法的设计”。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直试图有所创新:一是“观点新”,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例如“个体幸福的德育目标”的提法、“关注品德——当代人才观的新理念”等;二是“理论新”,根据最新的内隐心理的研究进展系统讨论个体品德的养成,并建构了“积极关怀的品德教育模式和品德矫正模式”;三是“材料新”,许多材料,例如,西方当代几种德育模式的介绍均是2000年以后的材料。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试图创新,也囿于作者水平,使得本书一定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书中大量引用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意,并真诚地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劳的安徽大学出版社编辑们致谢。

欧阳文珍

2004 冬于徐州

目 次

序	(1)
第一章 德育目的心理学新论	(1)
第一节 我国学校教育中的德育目的	(1)
第二节 重建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目标:关注个体幸福	(9)
第三节 个体幸福来源于良好的态度与行为风格	(16)
第二章 内隐记忆与德性养成	(22)
第一节 从无意识、无意记忆到内隐记忆	(22)
第二节 内隐记忆对于品行的制约作用	(29)
第三节 内隐记忆(学习)对于德育工作的启迪	(34)
第三章 儿童品德发展的心理基础	(47)
第一节 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	(47)
第二节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54)
第三节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理论	(59)

第四节 吉利根对于道德发展性别差异研究	(65)
第四章 品德养成的途径与方法	(73)
第一节 以语言为媒介的德育方法	(73)
第二节 榜样的示范作用的心理分析	(84)
第三节 奖赏与惩罚的教育途径	(89)
第五章 灌输式德育反思	(99)
第一节 灌输式德育的一般概念	(99)
第二节 灌输式德育的原因分析	(106)
第三节 心理学视野下的灌输式德育分析	(115)
第六章 德育模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124)
第一节 关于德育模式的几个理论问题	(124)
第二节 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	(129)
第三节 以人为本创立德育新模式	(141)
第七章 认知性品德发展模式	(144)
第一节 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发展观点	(144)
第二节 柯尔伯格的道德两难情景的讨论法	(146)
第三节 柯尔伯格的“公正团体”的理论与实践	(156)
第八章 关怀模式	(167)
第一节 关怀模式的基本理论	(167)
第二节 诺丁斯的母爱式关怀的道德教育模式	(181)
第九章 价值澄清模式	(193)
第一节 价值澄清理论的一般概念	(193)
第二节 价值澄清的基本理论	(197)
第三节 价值澄清理论在学校德育中的运用	(203)
第四节 价值澄清理论的评价与启示	(213)

第十章 价值教育模式	(220)
第一节 贝克价值教育理论的一般概念	(220)
第二节 贝克关于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观点	(228)
第三节 贝克的 价值教育实践和评价	(235)
第十一章 积极关怀的品德教育模式	(245)
第一节 积极关怀模式关于人性与儿童发展的基本观点	(245)
第二节 积极关怀模式关于学校德育工作的反思	(256)
第三节 积极关怀模式关于德育的基本主张	(260)
第四节 积极关怀模式关于培养德性的建设性意见	(271)
第十二章 积极关怀的品德矫正模式	(281)
第一节 品行障碍的一般概述	(281)
第二节 积极关怀教育模式关于品行障碍的矫正观点	(293)
主要参考文献	(298)

第一章 德育目的心理学新论

第一节 我国学校教育中的德育目的

一、德育目的的含义

长期以来,教育被当做一种有目的的影响,而德育也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当做教育的核心,甚至等同于教育的本身。那么,它必然贯穿着教育者的特定的意图,甚至仅仅是为了统治者、教育者而服务的。

当然,人们在行为的时候有明确的目的并不是坏的事情,在具体德育活动之前,人们在观念中提出和设定目的,在实践中实现和达到目的,这样才有助于调动主体的全部热情和力量,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奋斗。不仅如此,明确了德育的目的,还便于在整个德育的工作进程中,不断地反省认识,不断地调节教育的方式,以控制德育的整个过程。因此,没有明确的德育目的作为参照,那么工作的必要反馈就难以完成,德育的效率似也难以保证了。

然而究竟什么是德育目标,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经常笼统地表述为:培养德性,^①或者是“德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构建人的良好德性修养境界”,^②显然这里的错误在于它是一种并不提供具体内涵的循环表述方式。或者也正像不少学者所批评的,他们把德育的功能混同于德

① 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第19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② 张澎军:《道德哲学引论》,第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育的目的了。刘恩允关于德育的目标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所谓的德育目标反映的是教育者“想干什么”的思想。^①他主张,“想干什么”应该建立在“能干什么”的基础上。能干什么涉及的是德育的功能如何,想干什么涉及的是德育的目标,二者不应该被混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目的是主体的一种设计、期望,是实践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人在活动之前思想上设计的活动结果。所以,目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主观性。目的反映主体的需要,是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人对于自己的需要的自我意识。人是根据需要提出目的的,目的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客观必然性的实现,更主要的是自身需要的满足”。^②

詹万生在论述德育目标时所下的定义是:“所谓德育目标是指党和国家社会对青少年儿童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等方面的应达到的规格要求。”^③显然,这样的概念的表述是相当混乱的,还是反映了现阶段我们对于德育目标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从操作性定义的方式来对我们的德育目标加以限定是一种探究问题的好方法。这里可以用现行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国家教委1998年3月16日颁布)中所定目标为参照。该《规程》中提到的“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实际上是基础教育的德育目标。这个目标构想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适用于中小学所有学生的普遍的目标,即“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遵守纪律的公民”。一是在实现基本的德育目标基础上,为学生在道德、精神及社会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即“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并为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奠定基础”。前者是现实的目标,后者为潜在的目标。

① 刘恩允:《德育功能观的反思与高校德育目标建构》,《江苏高教》,2002(6)。

② 李太平:《德育功能·德育价值·德育目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6(6)。

③ 詹万生:《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第27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二、德育不能承受之重的目的

没有行动的目的,其行为必然浑浑噩噩,缺乏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为的目的性越强,动机水平越高,效率也随之同比地增加。几乎与缺乏目标的结果一样,过高的目标,也同样使人陷入情感的折磨中,使之失去行动的指南。心理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定理,叫做“耶克斯-多德逊”定理,是指人们的活动成效与动机水平的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的关系,即只有适中的动机水平,活动的成效才最大,过犹不及。在实际的经验中,我们也能够体验到面对高不可攀的目标所给人带来的懈怠感。战国中期,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就曾向他的老师提出:如今的“道”很高很美,只是人们修道就好像登天一样,“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其令人可望达到,以便于人们天天去努力修身呢?对于公孙丑的言论,虽然孟子并不以为然,并且给予了强烈的反诘,但是公平地评价,公孙丑的言论还是很实在,值得人们深思,而孟子的反诘不过是“偷换概念”,没有对准靶子去回击而已。^①

陈桂生分析认为,我们的学校德育目标过高,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原因。孟子主张的立大道,养浩然之气,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在孔子同其弟子问对中,也议论过类似话题。如孔子的弟子冉求提到:‘我不是不喜欢你所讲的道理,而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孔子的回答是:‘能力不够的人至少要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却自动停止前进了。’”(《论语·雍也》)孔子的话,看起来合情合理。其实他也同后来的孟子一样,对‘道’本身、‘道’的可行性不加反思,而只要求弟子不断地修身。什么是中途,凭什么

^① 孟子举例说,高明的木匠并不因为木工笨拙而废弃操作的规矩,神射手后羿也不致由于有些射手笨拙而改变拉弓的技艺标准。所以,“道”作为标准、规矩,是不应改变的。那么,君子(教师)怎么办呢?“引而不发,跃如也”。即,传道像是拉满弓,却不发箭,而作出跃跃欲试的态势,让弟子按照既定的标准自己修身养性。自然,弟子修养水平参差不齐,他们未必都能按照既定的标准去修养,那也没有关系,弟子中总归会有人按照标准自我修养。这就是所谓君子“中道而立”,无过无不及,弟子中“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这里孟子把道德实践与工匠的技艺训练混为一谈了。

说冉求未达到中途即知难而退,难道他一直不努力么?看来他对此不屑去想。关于德育,只考虑其必要性,不考虑其可能性,这才导致‘德育目标过高’现象的发生。”^①

陈桂生分析,由于西方社会一直反省“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虽然大多数的学者对于美德是否可教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道德灌输、道德说教不抱希望,使得人们在看待德育作用时不具奢望,同时对于学生的德性形成过程中教的作用也同样地持冷静态度。与之相近的是,黄向阳在介绍“美德是否可教”的讨论命题时,也介绍了许多西方学者怀疑、否认可以教给学生德性的观点。^②但是“在中国,自孔子以来迄于今,所关注的主要是‘德育必要性’问题,鲜有关于‘德育可能性’的正式交锋,就连冉求、公孙丑透露的思想苗头也难得见到。可见,在我国长期存在‘德育目标过高’现象是不足为怪的。”^③

我国学校中的道德教育目标究竟是如何地高呢?我们一方面可以对我们的教育现状(特别是德育要求)做一个逻辑的分析,另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的德育目标与国外的德育目标比较一下,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更加真实。2002年2月24日的《中国教育报》刊登了鲍东明记者采写的长篇报道:《让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德育》,以下是这篇报道的开头部分:

当前中小学德育现状究竟如何?近年来对此一直众说纷纭。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王瑛老师主持完成的北京市“九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北京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实效性研究”,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调查分《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北京市七个城郊区县的四十二所中小学的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学生2808人;选取与学生样本相关的任课教师、班主任及学校德育干部、校领导1447人。调查结果均通过统计对比分析。这项调查结果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前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提供了现时的着眼点和着手点。为此,我们对这项调查结果与分析特别予以报道。

①③ 陈桂生:《德育目标引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

② 黄向阳:《德育原理》,第71~7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调查结果 1 主旋律教育卓有成效,与学生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薄弱,研究者列出 12 项学校普遍进行的德育内容,即劳动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环境保护教育、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民主法制教育,让教师和学生分别对这 12 项内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和学生对学校 12 项教育内容实施效果的评价位次大致相同,80%以上的教师和学生都把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排在前三位,充分说明近几年学校在主旋律教育方面卓有成效。而被排列在最后三位的内容,教师和学生也基本一致,它们是心理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和“三观”教育,反映出这三项内容是学校德育的弱项。

在与此相关的教师和学生对学生思想品德状况满意度的评价调查中,也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研究者列出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尊敬师长、文明礼貌、诚实正直、助人为乐、关心国家大事、心理调节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共 10 项内容,结果是教师和学生的排位基本一致,教师、学生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是尊敬师长、文明礼貌、热爱祖国、热爱集体;而被教师、学生排在后三位的师生不大满意的是心理调节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和关心国家大事。在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对学校德育内容需求的调查中,研究者列出交通规范、文明公约、行为规范、自我保护常识、个人修养、竞争与合作、劳动态度习惯、时事与政治、择业指导、家政指导、法律常识、环境与生存等 12 项内容,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最需要的德育内容排列前三位的依次为个人修养、自我保护常识和文明公约。其中,初中生的排位与学生总体相吻合,小学生最需要的德育内容与学生总体的不同之处是排列前三位的有交通法规;高中生与学生总体不同的需要是法律常识。

令人感到非常难以置信的地方在于报道的名称是《让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德育》,发稿编辑在阅读的导语中也肯定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报道”,但是报道内容却明显矛盾,让人们怀疑它的真实性。例如报道中一面说,主旋律教育卓有成效,另外却又说老师与同学最不满意的是同学们

关心国家大事不够。

报道强调80%的学生和老师把“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效果列在前三位,排在最后三位的,是心理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所谓“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论是:“主旋律教育卓有成效,与学生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薄弱。”陈桂生认为:这是不是暗示我们所谓“主旋律教育”同“学生生存发展”并不息息相关呢?至于所谓“与学生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如果指的是“心理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那么把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与保健问题归结为“德育”问题是否错位?如果指的是所谓“三观教育”,其实,以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倒是我国最正规的“德育”,对它何尝忽视,它难道是“非主旋律教育”么?

我们认为,根据心理学的原理,个体的生存发展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与学生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一旦薄弱,那么学生们怎么可能激发出对于“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的热情呢?这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我们分析,之所以有80%的学生和老师把“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的效果放在最前面,恐怕是害怕不这样说会惹出麻烦的应付行为。如果我们的判断是事实的话,那么这种行为也表明学生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利于他们养成最基本的诚实、勇敢的道德品质修养环境之中。而不顾一切地拔高德育目的,恐怕正是造成问题的潜在原因。^①

如果同某些西方国家的德育比较,在这方面同样显示我们目标的沉重。如英国基础教育中的德育目标,一般以学生平均道德水平(中线)为基础。德育主要以平均水平以下的学生为对象,而使其达到起码的德育要求。至于超越平均水平向更高的目标努力,那是学生自己的事。这样,至少可以缩短德育目标以及德育本身同学生之间的距离。既缓解学生的逆反心理,亦能减少道德空谈和形式主义的举措。^②

我们认为,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在中小学生自我意识尚没有很好发

① 经验方面可以找到佐证,社会上一直流传着:“小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中学是集体主义教育,大学是文明礼貌教育。”——说明我们的教育目标在一开始就让学生承受了不能承受的重量。

② 陈桂生:《德育目标引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

展、他们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具体形象思维的阶段,就要求学生发展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因为发展崇高的目标而限制、排挤了他们最需要自我管理、人际交往能力与品质的培养时间与空间,那么,这样的德育目标必然会诱发学生与社会各方各种各样的心理抵制。

我们的德育目标另外的沉重之处在于,它罗列了非常多的发展方向,所谓的“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都需要发展,但是在设立这些发展目标的时候,却没有建立好完整的目标连接体系,同时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先后发展的顺序,因此在没有搞清楚德育究竟能有多少功能的前提下,就随意地增加了难以承受的德育目标了,由于“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实践领域的德育浮在水面上以虚务虚,难以找到深入探索的切入点”。^①

三、德育目标的出发点分析

德育目标是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定位的突出特点是理想化、重心偏高、片面强调政治性,同时,又缺乏层次性,忽视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基本上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塑造所有的学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恐怕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我们的德育主要是从社会的需要来设计德育的目的,中国是一个社会本位的国家,在近现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文革”时期,德育几乎单一地被界定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工具,德育泛政治倾向表现突出。这种德育观念是一种倒退,因为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同样讲究“治国平天下”,但是其前提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修身”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并且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基础,此乃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可惜现代的德育却是光叫马儿跑,却又不给它吃草,那么如何达到目的呢?

而目前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至经济建设,德育的经济功能的论证应运而生。社会上出现了文化问题、生态危机,希望德育去救火,于是又有了德育文化功能的研究、德育生态功能的研究等等。从表面上看,把德

^① 刘思允:《德育功能观的反思与高校德育目标建构》,《江苏高教》,2002(6)。

育视为万能的救世工具似乎提高了德育的地位,但这种外在万能而虚妄的功能观必然导致人们给德育背负了其自身无法承受的目标,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失望更大,德育也一下子由王子贬为庶民。

具体的学校道德教育实践领域,德育的功能也同样被夸大了。德育工作视为无所不能的实践,是精神上的原子弹,这种我打你通的观念,违背了学生德性形成的客观规律,在实际的操作中必然一次再一次地碰壁。但是,由于上面的政治压力客观地存在,“灌输”的信念依然坚定,那么只能够逼迫实际工作者违心地继续做德育的无用功。另外,由于德育的社会客观效率评价标准难以建立,因此实际的德育工作者也有能力敷衍上方——我们已经达到了长官所规定的德育目标了。你看,填表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在表白自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套话,而在给人写评语的时候,也同样给人在政治思想上戴了许多顶高帽子,实际的德育的无能与疲软,并不能被有效地监督,因此德育工作者自己也可以轻易地敷衍德育工作。

我们的德育目标不能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不尊重个体选择,不尊重学生的个体需要。例如在我国古代,德育一直是统治者“化民俗齐民心”的工具,希望人们成为躬行“三纲五常”的臣民,在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目标是容易达成的,但是时代已经演变成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演变成市场经济的社会,因此继续要求学生机械地服从统一规矩,这自然难以随心顺意。但是我们目前的学校德育“没有充分注意到个人在‘德’的发展中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把培养学生的‘德’的素质局限在一个过于狭窄的空间和理想化的模式中……(学生)独立自由的思维、创造的意识、批判精神,良好的个性心理素质等个性化发展需求则在统一要求和进程中大大地忽略了。”^①

^① 陈正良:《对学校德育目标问题的思考——从模铸到素质化》,《江西社会科学》,2000(6)。